

一代奇杰

明代文化名人李贽研究

陈曼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代奇杰

明代文化名人李贽研究

陈曼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封面题签：王 瑶
责任编辑：钱 晔
封面设计：韩同安

一代奇杰
陈豪平著

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牡丹江林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字数：25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07—00918—6/I—184 定价：4.15元

目 录

论文部分

李贽政治思想异议.....	(1)
李贽思想再议.....	(13)
试论李贽的史学观.....	(27)
李贽的美学思想及其特征.....	(39)
论李贽的诗.....	(56)
论李贽小说创作论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71)
李贽与焦弱侯.....	(89)
李贽与三袁.....	(103)
李贽与杨慎.....	(119)
李贽与冯道.....	(135)

附录

李贽的仕履政绩及其行踪考略.....	(148)
李贽交游考.....	(162)

詩文选注部分

文

与焦弱侯一.....	(192)
寄答京友.....	(196)
又与焦弱侯.....	(199)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205)

与周友山·····	(211)
与耿克念·····	(215)
与潘雪松·····	(217)
复杨定见·····	(219)
何心隐论·····	(221)
杂 说·····	(232)
童心说·····	(239)
高洁说·····	(246)
忠义水浒传序·····	(250)
李中丞奏议序·····	(256)
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263)
罗近溪先生告文·····	(268)
李生十交文·····	(283)
读律肤说·····	(288)
因记往事·····	(290)
五死篇·····	(296)
伤 逝·····	(302)
感慨平生·····	(303)
拜 月·····	(311)
红 拂·····	(313)
史记·屈原·····	(315)
绝交书·····	(317)
幽愤诗·····	(320)
思旧赋·····	(323)
杨升庵集·····	(325)
唐贵梅传·····	(328)

姜白诗题辞	(333)
伯夷传	(335)
李涉赠盗	(338)
阿寄传	(341)
释子须知序	(344)
自刻说书序	(346)
书苏文忠公外纪后	(348)
三教归儒说	(352)
论交难	(356)
宋景濂	(359)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362)
德业儒臣前论	(371)
诗	
读书乐并引	(376)
至日自讼谢主翁	(381)
哭耿子庸(选二)	(383)
哭黄宜人	(386)
夜半闻雁(选二)	(388)
塞上咏 时有倭警	(390)
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	(391)
咏史	(392)
却寄(选一)	(395)
初到石湖	(396)
送郑子玄兼寄弱侯	(397)
过聊城	(399)
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赋	(401)

过桃园谒三义祠	(403)
望海	(405)
答袁石公	(406)
聊城怀古二首	(408)
读杜少陵二首	(409)
石潭即事四绝 (选一)	(411)
系中八绝 (选五)	(412)
后 序	(415)

李贽政治思想异议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因为非孔非圣，遭到残酷的迫害，最后死于狱中。三百多年来，对于李贽及其学说的评价，由“毁誉参半”而渐趋统一，一致认为他是向传统的儒家圣教举行发难的志士仁人，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异己。但在基本统一的认识中，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例如李贽的政治思想到底是什么？是法家的、道家的抑是儒家的？李贽既然非孔非儒，当然他的政治思想就不是儒家的了，这是国内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也据此说李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从李贽的主要著作看，并无法家理论的色彩，说他是法家，殊多勉强。我们认为李贽的政治思想不是别的，正是传统的儒家政治观。李贽所维护的不是被封建统治集团与道学家所歪曲或破坏了的儒家政治学说，而是儒家政治学说的精蕴。

—

仔细搜检李贽的著作，我们发现李贽有许多非孔非儒的言论，同时又有许多赞美孔子的言论。这就出现了一个一方面批评孔子一方面又赞美孔子的李贽。有了后者，似很难一口咬定李贽是非孔非儒的人物了。

关于李贽赞美孔子的言论，可略举数端于下：

孔之疏食，颜之陋巷，非尧心欤！自颜氏没，微言

绝，圣学亡，则儒不传矣。故曰：“天丧予。”何也？以诸子虽学，未尝以闻道为心也。（《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更可笑者：一生学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荫后人……不知孔子何尝为求富贵而聚徒党乎？贫贱如此，患难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欢然从之，不但饿陈、蔡，被匡围，乃见相随不舍也。（《焚书卷二·与焦弱侯》）

不但释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于鲤，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尝为子牵也。鲤未死而鲤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尝为妻系也。三桓荐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视富贵如浮云……（《焚书卷三·书黄安二上人手册》）

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时有之，而惜才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郑而知郑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子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以为生才甚难，甚不可不爱惜也。（《焚书卷二·寄答京友》）

卓吾子勃然作曰：“我为上上人说法，不为此等人说法。此等人乃世间患得失之人，贤者耻之，岂吾所说耶！我为世间贤人多是如此，必欲进之于大圣人域，文王、孔子之归。盖必如此，然后能济事，然后能有益于君。此实载在《尚书》，著在《周易》，特无人提

动，不省耳。公看斯世谁不愿为文王、孔子大圣人者？”（《续焚书卷二·附史阁款语〔刘东星〕》）

今之学佛者，非学其弃净饭王之位而苦行于雪山之中也，学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学孔子者，非学其能在家也，学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焚书卷一·复邓石阳》）

这些言论的内容归纳起来是，学孔子乃学孔子之道，其道能济世益君，故以闻道为学习的中心内容；孔子未尝为子妻所累，从政为行道而不是求富贵；孔子一生坎坷，弟子相随不舍，由此益加证明孔子聚徒乃为行道而不是求利禄和富贵；孔子懂得爱惜人才，又能识别人才，他曾经慨叹过“惜才者之难也”，这便形成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主张，所以“孔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荫后人”，“斯世谁不愿为文王、孔子大圣人者”。这些内容都很重要，实际就代表了孔子学说的精髓及其为人的主要特征。这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李贽批判的锋芒究竟是针对谁？是针对孔子本人呢？还是针对打着孔子的旗号而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伪儒者呢？我们认为，李贽的锋芒是对准宋、元、明以来的那些假道学者、伪君子们。这仍然要以李贽的言论来作说明。兹举众所周知的几段：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是，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

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末行罚赏哉？（《藏书·衡鉴纪传总目论》）

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刘潜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终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焚书卷三·赞刘潜》）

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第一段引文其实是论述是非的相对性。李贽认为是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要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是非的标准，而且由于各种人的生活条件的不同，而不能有划一的是非的“定论”和“定质”。因此他认为，即使孔子的原则在当时符合是非的标准，但千年之后，条件和情况完全不同了，若孔子活到现在，也要改变其是非标准的。这段话并没有否定孔子本身的理论，侧重点在于批评后世理学家打着孔子理论的旗号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既没有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也没有以后世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他们本身之是非为是非，因而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第二段引文，则是针对朱熹的。后段引文，则正如文中所说，是明确地针对宋代程、朱等理学家的，但这也应当看成不仅针对程、朱等几人，而且是针对这个等而下之的俗儒、腐儒集团。李贽如此无情地抨击他们，用辛辣的语言加以嘲弄，就是因为这些假道学家们不过以孔子及其儒家作为标榜，行利己

之私。他们不是心存社稷，而是志在高官、巨富，不是行道爱民，而是欺世获利。这和儒家所揭举的“仁政德治”、“爱民利国”等政治主张大相违忤。李贽揭露他们“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是最恰当不过的。袁中道《李温陵传》中有一段话说得好，是对李贽许多大胆言论极好的理解：“而世儒观古人之迹，又概绳以一切之法，不能虚心平气，求短于长，见瑕于瑜，好不知恶，恶不知美。至于今，接响传声，其观场逐队之见，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于是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所长。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窍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是十分重要的，有助于对李贽的政治观作出明确的结论。

二

李贽的儒家政治观，还表现在对明太祖的虔诚的恭维和对有德政的历史人物的歌颂。我们看李贽对明太祖的礼赞：

我太祖高皇帝，盖千万古之一帝也。古惟汤、武，庶几近之。……惟我圣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时时用兵，时时禁谕诸将，无一字而非惻怛，亦无一字而出于忠诚，故天下士咸愿归而附之，而乐为之死也。（《续焚书卷一·小引》）

君之难，难于得臣；臣之难，难于得君。……君知其难，则自能旁搜博采，若太祖皇帝然，惟务得人而后已。（《续焚书卷二·史阁叙述》）

李贽对明太祖的赞辞，我们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他竭诚地拥护处于上升时期又推行开明政策的封建政权；封建统治者应心存社稷，顾念臣民，无时或忘小民的疾苦；应思贤若渴，贤能者务得之以为辅。我们考查明史，明太祖的施政设施，宜乎李贽作如此由衷的称颂。明太祖称帝之后，推行了几项重大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整顿吏治方面，对贪官污吏的严惩，于史罕见。他规定：地方官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者，就斩首示众，并剥下贪污者的皮陈之于特别建立的庙堂内，使官吏视之触目惊心而知所儆戒。对中央官吏的惩治亦复严酷。如户部侍郎郭桓与中央六部及各地方官勾结，大肆贪污，赃款达七百万。朱元璋对这个贪污集团严加惩处，牵连而死的达数万人。历代各级封建统治者，大都贪污虐民，为官清廉者百不得一。朱元璋如此严厉地打击这般贪官污吏，难怪使得疾恶如仇的李贽衷心拥护了。朱元璋是崇儒的，一代儒宗如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都被他罗致在幕下并加以重用。他用人不拘一格，如杨士奇以处士、陈济以布衣被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他求贤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待贤且才者而后用之。实行科举以前，征至京都的儒士，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人。自科举复兴，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至建康，则创礼贤馆以处之，足见明太祖对贤儒的礼遇与重视。朱元璋制定的兴修水利，垦荒屯田，种植经济作物等几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生产的发展。这些政策从根本上看，当然还是为了维护整

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在客观上也必定给人民带来某些利益。朱元璋要求经生和官吏以经义治事，志在关心民间疾苦。《明史·门克新传》载：苛岚州学政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桓给由至京师，上问民间疾苦，皆对曰：“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远方，榜示天下学校以为鉴戒。朱元璋曾说，“恣意奢侈，使百姓困乏”，将会“至于乱亡”。他一再告诫其子孙和臣僚“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均见《明太祖实录》卷176、76）。我们从明太祖推行的这几项政策看，他所遵循的基本上是儒家的政治路线。故李贽在《史阁叙述》中说：“呜呼！合是三者而观之，而后知我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况自是而后，建文继之纯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则又恩威并著而不谬。仁宗继之纯用仁，而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则又仁义并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昭圣未宾，三杨犹在，尚行二祖三宗之政乎！则我朝仁义立国，爱民好贤，盖相继百有余年也，自古开创之君曷尝有此哉！”李贽之主张以“仁义立国”昭昭然无庸辩白了。

因此，李贽对于历史上有过德政的清廉刚直之吏则满怀激情地备加揄扬，例如他对稍前于他的海瑞，特别盛赞其爱民和清廉：

淳，岩邑也，地瘠而民啬，所产茶竹杉柏外，无他物，且重岩复嶂，民易逃匿。山下田亩，悉归右姓，穷民卒岁不粒食。……公慨然思拯之。

兴国地故单薄，岁赋不入，民苦浮粮为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独亟清丈，以苏贫民而均其赋。

又吴俗贫富相倾，弱者率献田于其豪，以为奸利，输必不入。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贪暴者，多窜迹远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

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盖异之也。

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贫无可给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殓。（《续藏书卷二三·海忠介公瑞》）

清廉的官吏必然爱民，要爱民则必施仁政。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施仁政的清官。而反对苛政，主张“保民而王”，为官要清正刚直，正是传统的儒学政治观。李贽属意于此，则其政治观之属于儒家者明矣。

三

但是，李贽为什么如此猛烈地攻击与他同时代的封建官僚及他们标榜的理学？这是极容易理解的。明代后期的政治已腐败得不成样子。封建官僚们大肆搜括老百姓，人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贤者遭到排斥和打击，奸臣秉执政柄，为非作恶。但是官僚们恶贯满盈却满口仁义道德，他们窃国害民却又高喊孔孟圣哲。李贽猛烈地攻击他们是假人，所行的是假道学，理由正在于此。

明代从英宗到武宗时期，出现了宦官专政的局面，政治腐败日甚一日，统治也日趋衰落。宦官参与朝政，始于明成祖。明成祖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曾给予宦官一定的权柄，

使之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至明代中叶，英宗、宪宗、武宗等长期不上朝听政，宦官则乘机窃夺政柄，挟制内阁，国家大政由此旁落到宦官之手。宦官大都是一些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之徒，所以一旦得势，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我们都知道明代有两个臭名昭著的宦官代表，一个是武宗正德时期的刘瑾，一个是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他们的爪牙遍布国内，控制着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他们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专权擅政，荼毒人民。所以明朝政治腐败与恐怖之甚，清廉正直之士遭受迫害之烈，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宦官都是吸血鬼，他们到处侵夺人民的田产，又肆意贪污受贿，宦官头目都成豪富，家累万金。宪宗时宦官汪直占田达二万余顷。武宗时宦官刘瑾，家有黄金二十四万锭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则更多。

这一时期的阁臣，从内阁大学士到百僚也是联朋结党，贪污成风。在内阁长达二十一年的严嵩，在陷害首辅夏言后，取代了夏言的地位。徐阶支持其同乡董传策、门生张冲、御史邹应龙、杜润等上疏劾嵩及其子严世蕃。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父子事败，徐阶代严嵩出任内阁首辅。徐阶又为大学士高拱所取代，高拱则为徐阶的门生张居正所取代。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官绅勋贵贪污成风，兼并土地有增无已。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又“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明史·邹应龙传》）。徐阶仅在松江占田六万亩，一说二十万亩或二十四万亩。上行下效，地方官亦恣意中饱，多多益善，如江西安远叶楷占田十八万亩。如此吸血鬼遍布朝野，受害者都是普

通劳动人民。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遂有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代后期的文坛，在政治哲学方面，理学家继承宋代程朱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说教，作为明代后期腐朽的官僚地主阶级为自己辩护的工具。这些理学家口谈仁义道德，肚里男盗女娼，正如李贽所揭露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他们之提倡理学，不过是作为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和掩盖劣迹的遮羞布，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含义了。

李贽深切地了解封建官僚和理学家们的灵魂深处，乃无情撕碎这块遮羞布，使之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李贽之所以上溯儒者之祖，那是因为假人们正是打着儒者之祖的旗号。这也是李贽面临的一个大矛盾。这个矛盾导致了李贽有时要非孔非儒，有时却又赞孔赞儒，而我们正从这一矛盾中窥见李贽的真正意图。

四

对李贽的为人为学为政，在历史上不理解的人是很多的。甚至象谈迁、顾炎武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只看到事物的现象，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因此他们对李贽的评论，不仅是不公平的，实际也是一种诋毁。兹各引一则于下：

忠逆本于士心，即教官何能为？宋士习坏于王介甫新说，今士习之坏，自晋江李贽始。（谈迁《国榘》卷七十九）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